

## ※研究動態※

# 毀譽參半的文化工程 ——「夏、商、周斷代工程」回顧與評述

陳 寧\*

由中國政府資助上千萬人民幣、轟轟烈烈地進行了五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為「工程」）在中國大陸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有的媒體甚至把它稱為「中國文化史的最偉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樂大典》和清代《四庫全書》的纂修。二〇〇〇年十月，「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以下簡稱《簡本》）。《簡本》的結論也全部通過了中國國家科技部的驗收，且在大陸榮獲「全國十大科學進步獎」。而就在《簡本》發表的前後，抨擊的聲浪不斷在海外出現。有的評論認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的則從學術角度提出批評。史丹佛大學的大牌教授 David S. Nivison（倪德衛）在《紐約時報》所下「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的斷言，也成為一句學術界廣泛流傳的名言。中國媒體將這些抨擊視為「敵對勢力」、「帝國主義」。二〇〇二年四月，「工程」專家組組長李學勤、首席科學家仇士華等應邀赴美參加了有關「工程」討論的學術會議。這次會議是「工程」兩種不同的觀點在國際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對面的交鋒。在會議上，海外的學者對「工程」的方法和結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從而引起了學術界的軒然大波。「夏、商、周斷代工程」究竟是什麼工程？「工程」在學術上是否有硬傷？其結論是否可靠？本文作者在海外從事中國歷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和一些與「工程」有關的學者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對「工程」有比較細緻的了解，從而也就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在此我們姑且拋開政治背景和媒體的激烈言論，僅圍繞在學術上的問題，介紹有關「工程」的前後始末。

---

\* 陳寧，桑塔克拉拉大學 (Santa Clara University) 宗教系、歷史系講師。

## 「工程」的緣起

中國人都聽說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這是因為古代文獻中清楚地記錄了夏、商、周三個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來說，司馬遷的《史記》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八四一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兩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無年代。這就是說，五千年文明史中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對中國人來說，這使人說起五千年文明史來「理不直，氣不壯」；對學者來說，「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學界的公認」而令人憤憤不平。一九九五年，當時任中國國務委員（相當於副總理）、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參觀了希臘、埃及、以色列等文明，發現愛琴文明、古埃及文明、亞述文明，都可有據可稽地上溯到公元前三、四千年。這使宋健深感「不適」並決定要填補中國文明史的空白。

由於宋健的推動，「工程」於一九九六年正式設定，成為中國「九五」期間重點科技計劃項目。為了使工程規定的目標能順利實現，中國國務院成立了由國家科委副主任鄧楠（鄧小平之女）為組長，七個部委領導為成員的領導小組，李鐵映、宋健二人為工程特別顧問。聘任歷史學家李學勤、碳十四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為工程「首席科學家」，主持由二十一位不同學科的專家組成的專家組工作。這個科研項目，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分九個課題，四十四個專題，直接參加的專家學者就有二〇〇人。據報導，這一高層次的科研工程，連辦公室秘書都是博士後。「工程」要達到以下的具體目標：

- 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半段各王，確定比較準確的年代。
- 二、商代後期從商王武丁至帝辛（紂），確定比較準確的年代。
- 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 「工程」的主要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兩條途徑來建立三代年代學系統，一是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蒐集、整理、鑑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並作必要的挖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碳十四測年。

經過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終於發表了《夏、商、周年表》。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約為公元前二〇七〇年，夏、商分界大約為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商、周分界具體為公元前一〇四六年。又將具體的帝王年代從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〇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後期的王，在他以後的各王都給予了具體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從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體的劃分。西周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來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礎於武王伐紂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其他的年代依據這兩個年代進行安排和調整。因此，這兩個年代的確立是「工程」在西周年表方面最引以為自豪的成果，下面簡單介紹其研究過程。

先說懿王元年的確定。《古本竹書紀年》（後人輯錄的周代文獻）記載說：「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當時的「鄭」被認為是今天的陝西華縣。什麼叫做「天再旦」？專家認為，這是一種奇異的天象，意謂「天亮了兩次」。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天亮兩次」呢？只有在太陽出來前，天已放亮時，忽然發生了日全蝕。這時，天黑下來；幾分鐘後，日蝕結束，天又一次放明。這就是「天再旦」。「工程」中有一專題組利用一九九七年三月九日發生日全蝕的機會，到新疆北部組織觀測，證實了早上日出前發生日全蝕的時候，確有「天再旦」的現象。結合公元前一〇〇〇年至公元前八四〇年間中國能見到的全部日蝕，確認鄭地見到「天再旦」日蝕的年代為公元前八九九年，因此這一年就是懿王元年。

武王伐紂的年代是商、周兩代的分界，對三代年表的建立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於文獻對這一事件的記載十分簡略，所以歷來對武王伐紂年代的研究，其結論差距很大。據「工程」統計，各家對伐紂之年的說法有四十四種說之多，跨度從公元前一三〇至公元前一〇一八年，前後相差一百多年。因此，「工程」所列的三十

九個專題中，有好幾個專題的研究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武王伐紂問題有關。

一九九七年「工程」在澧西遺址（據史書記載，澧西是周文王在澧河西岸建立的都城，十三年後武王克商）的挖掘中，發現了一組可以分期的文化層。第一期文化的時代（即最早的一期）被定為「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時期；第二期為「武王至成王前期」等等。由於澧西遺址中早期的文化被認定是武王克商前後形成的，其遺物就可以幫助確定克商的年代。「工程」用碳十四測得的年代經「擬合」換算為日曆年，確定為公元前一〇五〇至公元前一〇二〇年之間。也就是說，武王克商的歷史事件，應在這一年代範圍之內。由於這一時間段的跨度比四十四種說法所跨的一百餘年小了許多，這就可以把四十四種說法中的相當一部分排除在外。這「無疑是一次重大突破」，但還不是武王伐紂的具體年代，因此「工程」有待於古代天文學的研究，方能定出西周的年代。

「工程」依據的古代天文學的材料主要來源於一件在陝西臨潼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利簋）的銘文和目前流傳下來的周代文獻《國語》的有關記載。〈利簋〉有一句銘文說：「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工程」認為這是說克商的那一天是甲子日的早晨，這也證明傳世文獻中記載的克商那一天的干支日為「甲子」是可信的。另外，〈利簋〉銘文又說：「歲鼎克聞夙有商。」「工程」釋句中的「歲」為「歲星」，即木星；「鼎」作「當」解，指歲星正當其位，即歲星正好運行到周國在天空中相應的區域，史稱「分野」（古人將地上的區域與天上的區域相對應，如天上十二星次與地上十二個國家對應，從而可以通過觀察天象預知地上將發生的事件或解釋已發生事件的意義；周的分野區域稱為「鶉火」，是木星所經歷的十二星次之一）。另外，《國語》也說：「昔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工程」的天文學家根據這幾條天文材料，計算了當時日月星辰的位置進行，得出了武王克商發生在公元前一〇四四年和公元前一〇四六年兩個結果。二者哪個準確呢？「工程」認為，前者與西周金文曆譜不太吻合，而後者則更合適一些，因此公元前一〇四六年被確定，公元前一〇四六年為克商之年。

上面提到，「工程」是以碳十四技術獲得的重要數據，再通過「工程」發明的「擬合」的方法得出樣品的日曆年代。碳十四和「擬合」是「工程」取得《夏、商、周年表》的關鍵「法寶」，讀者有必要了解一下這兩項技術。碳十四是一種在大氣中存在的放射性元素。它因光合作用而被植物吸收，並貯存在植物之中。人和

動物需要食用植物，於是也在人體和動物體內存留。生物在存活期間，他們不斷地從大氣中獲取這種放射性碳。但是任何一種動物或植物一旦死亡，它就停止吸收，而且會使存留體內的這種放射性碳不斷減少。大約在五七三〇年間，它的含量可以衰減一半。因此，只要用儀器測出樹木、穀物、人骨、獸骨等生物遺骸中現有的碳十四含量，與它原始的碳十四水平相比，就可以推算出它們在多少年前死亡，進而可以推斷與它們共存的遺存（諸如建築遺址、墓葬或其它遺物）距今大概已有多少年了。

通常的碳十四年代不能算是日曆年代。這是因為大氣中的碳十四水平自古以來並不是恆定的。將碳十四年代轉換為日曆年代，需要進行樹輪校正。樹木每年生長一輪年輪，各個年輪同日曆年代相對應，而過去大氣中碳十四水平變化的信息恰好儲存在樹木年輪中。把自古至今的樹木年輪木片分別測出碳十四年代，然後以樹輪年代就可以把測出的碳十四年代轉換為日曆年代。由於某些原因，現代的樹輪校正技術不能夠得到樣品的準確的日曆年代，只能是一個年代範圍，稱為「置信區間」；而不同的計算方法獲得的數據的概率也有高低之分，這種概率稱為「置信度」。一般說來，置信度高的，置信區間就寬，反之亦然。譬如，使用置信度只有68.2%的計算方法，雖可獲得較窄的日曆年代範圍，但獲得真值落入這個範圍的概率只有68.2%。

另外，單個碳十四年代轉換為日曆年代時往往誤差會增加，因此過去的碳十四測年大都限於史前時期，只求得一個大概的年代範圍，而用於歷史時期的測年則精度不夠。因此，「工程」設計了一種「擬合」方法，提高碳十四測年的精確度。所謂「擬合」，就是用一組時代先後有序的樣品（而不是單個樣品）測出一系列的碳十四年代，同高精度樹輪校正曲線匹配擬合，就可以使碳十四年代轉換為日曆年代時誤差大為減少。

## 「工程」受到的批評

自「工程」的《簡本》公布以來，海外學者對此進行了三次規模較大的辯論，其中持懷疑和批評立場的似乎多於「工程」的擁護者。第一次辯論開始於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是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其議論主題有政治性與學術性兩類。政治性方面的集中在「工程」是否在宣揚民族主義；在此我們不作介紹。學術性的則圍繞夏朝

的存在與否。「工程」不僅相信夏代的存在，還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對此，不少西方學者持懷疑態度。在西方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教科書中夏朝只是傳說中的一個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這是因為甲骨文證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學者批評「工程」想當然地視夏為商的前朝並定二里頭（在河南省）為夏都，在目前情況下證據尚未充足。綜合看來，支持「工程」的學者的依據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獻認為的夏人的中心地區，而這個地區的二里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頭遺址發現了宮殿基址，表明已經有了國家的存在；其三，碳十四測年結果表明，二里頭文化的時間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馬遷所論的商朝被證明是信史，那麼他所說的夏也應當是信史。一些西方學者則認為，周代文獻中論述的夏人的活動很可能是周人出於政治目的而編造的，不能盡信。再者，二里頭文化的水平還不足以證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貧富不均的社會）的發生，「除非我們能夠在二里頭發現文字、青銅器和車等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標誌，否則史前和歷史時期的基本分界線還將是商」。至於司馬遷《史記》的可信性，一海外學者反詰說，《史記》也提及商的第一個王是他的母親踩到一只大鳥的腳印而受孕以及有關黃帝、堯、舜、禹等超自然行爲，難道這樣的記載也能視為信史嗎？

以上的辯論只是一場參加者的筆戰，而學者面對面的交鋒發生在第二次討論上。二〇〇二年四月四日至七日，美國「亞洲學協會」的年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會議專門邀請了「工程」的學者來美討論。中國方面參加會議的是「工程」的專家組組長李學勤、考古學家張長壽、碳十四專家仇士華、天文學家張培瑜。這場討論雖然稍微涉及政治方面的問題，但中心問題一直圍繞「工程」的西周年代學研究。不少海外學者以口頭的和書面的形式對「工程」的結論提出了疑問。下舉數例：一，「分野」的理論晚出，很可能出現在東周時期列國形成之後，西周時就有「鶉火」與周相搭配的觀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論用於西周時期。二，青銅器〈利簋〉銘文中「歲鼎克聞丕有商」的「歲」字更可能做「年」講，並非指「歲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一〇四四年而選定公元前一〇四六年為克商年代的天文學依據是不符合王國維對於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則普遍得到學者的認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書紀年》有關西周年代的記載，一味斷定其為偽造，而學術界對其真偽尚未有定論。五，「工程」執行的「民主集中制」不符合學術界的規矩。六，「工程」使用的碳十四計算程序僅有68.3%的

置信度。七，「工程」對一個晉侯墓的碳十四測量得出若干差距較大的數據，而「工程」在不同的論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數據，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學者對「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如：芝加哥大學的 Edward Shaughnessy（夏含夷）教授提問說：「公元前八九九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鄭』的日蝕是《簡本》的關鍵年代之一，中國國內的報紙、電視均作了廣泛的報導。然而，在國外，早已經有人指出這個日蝕對當時年代的意義。一些海外學者覺得《簡本》完全沒有提到國外學術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學術道德。」另外，通過天文學研究而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定為公元前一〇四六年是美國學者 David Pankenier（班大為）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提出的，而《簡本》對此隻字未提。Shaughnessy 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我們知道，甲骨文專家董作賓早就指出「天再旦」是發生在天明時刻的日蝕現象，並將此一天文現象發生的年代定為公元前九六六年。後來，韓國學者方善柱在一九七五年發表的論文中進一步指出，公元前九六六年有誤，正確的年代應為公元前八九九年。

由於華盛頓會議的時間有限，與會的「工程」學者未能對以上所有的問題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學勤強調，「工程」的學術觀點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學者決定。他堅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為「我個人從來認為，科學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甚至個別人手裏」。至於「天再旦」的問題，李學勤解釋說，《簡本》篇幅有限，未能將前人的工作一一羅列。張培瑜則承認對「天再旦」的報導有不妥當之處。仇士華對碳十四方面的背景知識提供了進一步的介紹和解釋。

這一輪的討論並沒有消除雙方的學術歧見，從而「面對面的對話」於四月十二日轉入芝加哥大學繼續進行，也就是學者間的第三次辯論。這次辯論的熱烈和效果遠遠超越前兩次，甚至出現了驚人的辯論高潮。批評「工程」的學者中，最值得介紹的是現任史丹佛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職研究員的蔣祖棣。他向會議提交了一篇題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的文章（以下稱為〈蔣文〉）。〈蔣文〉最重要的內容是討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蔣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 OxCal 系列樣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學求得這一程序，並以此驗算了「工程」發表的、為數不多的碳十四數據。結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範圍遠遠大於《簡本》公布的「擬合」數據。〈蔣文〉介紹說，OxCal 程序系列樣品計算法，雖可獲得較窄的置信區間，但只有 68.2 % 的置

信度；此計算程序的精確度備受國際碳十四學者的批評。「工程」以這樣低的置信度作為衡量西周具體王年的標尺很不科學。「工程」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達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蔣文〉分析說，其原因是後者的置信範圍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從而達不到「工程」領導規定的「碳十四年代數據的精度，要達到正負二十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選置信範圍小的計算法可以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壓縮到幾十年內，從而排除四十四種說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說，「工程」為了排除更多的觀點，寧願犧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蔣文〉又指出，「工程」依據的 OxCal 程序的系列樣品計算法不代表國際公認的樹輪校正法。國際碳十四專家已指出這一算法的過程中夾雜了人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並不準確。其人為成分是指在計算中碳十四專家需要考古專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樣品」，即一組分期明確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樣品。而考古學家很難提供如此精確的樣品，勉強為之，則帶有很大的猜測或人為成分。〈蔣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報告為例。「工程」的斷代方法將澧西各個文化層以西周各王為名稱，如：第一期是「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等等，這樣的斷代法稱為「間隔的」。而〈蔣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過考古發掘，其報告在一九九二年公布。他所用的斷代方法稱為「漸序的」，就是將各個文化層以大概的年代範圍標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區別在於「間隔法」要求各期在具體年代上有明確的上下界限，相鄰各期在時間上必須彼此斷開，不能有交錯；而「漸序法」則沒有這樣的要求，只標出籠統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蔣文〉強調，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間隔法」非常不合適，因為出土的陶器、穀物、木頭等物品並非隨新王的即位而改變。再者，從某一層取出的樣品並非肯定代表這一層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過去就已經準備好，並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十四數據就不能視為它隸屬的那個文化層。

〈蔣文〉還認為，「工程」認定澧西第一期是從周文王時期開始的，這意味著文王遷澧前，那裏沒有人居住過。這種假設沒有文獻上的支持，也沒有考古方面的有力證據。更不可思議的問題是，「工程」的澧西文化分期，短的只有十二年或者十五年，如第一、二期，而長的則有一〇八年，如第六期。〈蔣文〉問道：「什麼樣的地層學類型學研究，可以把三千年前沒有文字或圖形等明確標誌的陶器群分到十年一期的精度？」可見，「工程」使用間隔法斷代澧西的文化層，既不符合考古規範，也大悖常理。然而，「工程」為什麼這樣做呢？〈蔣文〉認為，其目的在於



縮小武王伐紂這年的範圍。如果在考古上不使用間隔法，就不能向 OxCal 程序的系列樣品計算法提供「系列樣品」，也就得不到公元前一〇五〇至一〇二〇年的伐紂年代，也就不能排除他人的年代觀點。也就是說，「工程」的灋西考古人員將不可靠的考古信息提供給「工程」的碳十四專家，後者又藉助一個置信度只有68%的、備受國際專家批評的計算程序，最後得出一個較小的「武王克商」的年代範圍。這一年代範圍的可信性顯然有問題。依據這個有問題的年代所編排出的《西周年表》當然會有漏洞。

〈蔣文〉的結論是，「工程」所謂的「多學科研究」的創造，主要還是用非文字證據的研究來解決西周年代問題。而考古地層的劃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誤差有數百年的碳十四技術，對史前考古很有幫助，但根本不能應用在需要具體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從學術角度看，〈蔣文〉對「工程」的批評有理有據，是非常客觀的。「工程」所犯的錯誤，不是某個學術觀點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會議上，蔣祖棣向與會者（李學勤缺席，他在華盛頓會議之後便回國）口頭介紹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觀點，並以自己帶去的計算機和 OxCal 序列程序當場對「工程」公布的碳十四的若干數據重新進行驗算，結果明顯與「工程」的有差距。仇士華對蔣祖棣提出的問題表示認同，並表示他個人也對《簡本》的碳十四數據持有疑問。張長壽也明確表示他個人同意蔣祖棣對於灋西考古分期的意見。在場的 Shaughnessy 教授為之大震，他拍案問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十四與灋西考古的基礎之上《西周年表》還站得住腳嗎？參與會議的張立東（曾任「工程」的秘書，現為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生）將會議內容介紹在國內的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的《中國文物報》上，其中對「工程」專家同意蔣祖棣的觀點也做了的相關的報導。報導立刻在國內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兩個多月後，《中國文物報》於八月十六日刊登了一篇題為〈美國之行答問——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文章，是作者蘇輝採訪有關專家後寫的，聲明張立東的報導不符合事實，「在關鍵環節上引起讀者的誤解」。如，依據蘇輝，仇士華回憶在芝加哥的會議情況時說：「蔣祖棣要求當場用計算機驗算數據，根據我提供的條件，結果發現只相差一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二年，但這都在誤差允許的範圍內，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為了判斷兩種完全相反的報導孰是孰非，本文作者電話採訪了幾位當時參加芝加哥討論會的海外學者。他們都說自己親耳聽到仇士華表示同意蔣祖棣的意

見，而且還爲仇士華的這種不嚴肅的態度感到驚訝。

無獨有偶，被〈蔣文〉批評的〈97年澧西發掘報告〉作者徐良高也有類似的表現。徐氏在最近的《中國文物報》上，申辯他在報告中使用的分期術語是「年代約相當於」某王時期，而〈蔣文〉在引用時，「均將之刪去」。爲此，筆者特地核實了〈發掘報告〉，原文是：「第一期：我們推定其年代爲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第二期：我們推定其時代爲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蔣文〉引文完全忠實於原文。從仇士華否認自己在討論會上的發言，到徐良高不承認已經發表的文字，我們懷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學者的治學能力和態度。難怪有人在《文物報》的網站上評論說：「他們連最近發生的事情都說不清楚，對『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說清？」

### 「工程」的現狀及其引發的深思

〈蔣文〉和張立東的報導在國內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蔣文〉也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海內外學者（包括「工程」的參加者）的支持。此文現已被中國考古學會會長、德高望重的考古學家宿白先生選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之中。國際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教授也將〈蔣文〉推薦到《漢學研究通訊》並爲之寫跋語。由於〈蔣文〉的批評，「工程」召開了數次有關西周年代的會議，商量如何回應，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據國內知情者透露，在學術上，「工程」內部已無力回擊〈蔣文〉的質疑（這一點我們已經可以從仇士華和徐良高的回應文字中看出來了）。其實，《簡本》中的很多內容，並不是「工程」學者的共識，他們尤其對《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異議。因此，在今年八月底（即芝加哥會議之後的四個月）召開的討論《繁本》的專家會議上，不少的與會者採取了慎重的態度，他們公開要求對每個學術上有爭論的問題都列出各種不同意見。由於學者們的這一主張，已經大致寫好的、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獲得通過，致使「工程」自啓動以來首次擱淺。筆者認爲，「工程」學者這樣的態度是負責的、符合學術規範的。

平心而論，「工程」並非完全失敗，參加「工程」的某些學者個人的研究就獲得了很好的學術成果，如天文學家張培瑜等。但是，《簡本》的確存有這樣或那樣的學術硬傷，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其觀點肯定不會被學術界普遍接受。還有，我

們知道，包括埃及在內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學，主要依靠國際學術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工程」既然是一個與國防無關、難度很高的文化項目，就應該邀請國際有關專家參加，起碼要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工程」沒有這樣做，而是閉門造車。「擬合」的具體過程至今沒有公開，所公布的碳十四數據也僅僅是一小部分。另外，對「工程」成果的審核，也沒有任何海外的專家參加。這樣的年表，應該很難讓國際學術界接受。

筆者仔細讀過一些海外學者批評「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預言「工程」報告將會被國際學術界「撕成碎片」的 Nivison 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國漢學界研究中國古代年代學的領導者，並創立了一種新的年代學理論，前文提到的 Shaughnessy 就出於他的門下。筆者注意到，Nivison 完全是從學術的角度討論問題，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有文獻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學的證據。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見，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結論之所以站不住是因為「工程」在眾多不同的解釋或觀點之中挑選一種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時，沒有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與證據。Nivison 的感受並非孤立，最近日本學者成家徹郎發表的文章也談到「工程」對他提出的疑問置之不理，成家並且以實際的例子指出「工程」學者「忽視不利的（文獻）資料」，「改變不利的（金文）記述」等。也就是說，無論是身為華裔的蔣祖棣，還是美國的 Nivison 以及日本的成家徹郎，他們都是學者，都是本著嚴謹的治學態度來對待和衡量「工程」的結論。雖然他們的批評使「工程」未能實現其原定的目標，但他們的工作是有積極意義的，體現了學術容不得半點虛假的態度。

到目前為止，雖然《繁本》還沒有通過，但《簡本》已經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辭海》和一些字典採用，而且據說也要寫入中、小學，甚至大學課本。近期還有中學教師在出高考的模擬考題時，將《夏、商、周年表》視為唯一的正確答案。如果《繁本》的內容未經修改而強行通過，其錯誤的觀點將被社會視為定論而全部接受，這必將誤導中華子弟。聽說「工程」的下一個目標是「追尋中華文明的起源」，即試圖證明傳說中的黃帝、炎帝、堯、舜、禹等人的存在，並儘可能地把他們的年代整理出來。如果「工程」繼續延用過去的指導方針和研究方法，所「尋」出來的東西，學術界肯定不會接受，甚至貽笑於後世。當今的日本政府因干涉歷史教科書的內容的寫作，禁止將二戰期間日軍侵略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罪行寫入教科書一事而倍受國際批評，如果「工程」效法

日本政府的做法，將會處於非常尷尬的地位。因此，筆者誠懇地要求「工程」三思，切勿草率行事。

「文化革命」時期，大陸學術界被政治烏雲籠罩，文革結束後知識界得以大放光明。但是，近來學術風氣普遍受到不良因素的影響，很多所謂的教授、學者，不是「翻炒」自己已經發表過的文章，就是粗製濫造地拼湊內容，甚至還公開抄襲和剽竊他人的作品。而「工程」在學術上不嚴謹的方法與不慎重的結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目前不良學風的影響。這種不正的學風不僅背離了中華民族學術的傳統，而且降低了中華民族的自豪感，甚至破壞了中華民族在海外的形象。如果「工程」發揚嚴肅的治學態度，不僅不會改變人們已經形成的中華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於民族自豪感的提高。因此，我們殷切希望「工程」的學術負責人李學勤能夠真正負起責任，嚴肅端正「工程」自身的治學態度，正確對待批評意見，切實履行「歡迎國內外同行進一步參與討論和交流」的諾言，最終實現「工程」學術上的「天再旦」。